

A stylized world map composed of a grid of grey dots, with several dots highlighted in red to represent specific regions.

# 通过交叉分析 理解亚洲劳动移民遭受的 多重歧视

SOHOON LEE 和 NICOLA PIPER

2013年8月

- 用交叉法分析劳动移民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亚洲女性劳动移民所面临的多重歧视机制和她们本身的多重身份。决策者如能认识到移民多重身份之间的交互影响，如非公民、女性、低收入、抵债劳动和无合法文件等，将设计出针对女性劳动移民的更为全面的响应方案。
- 女性劳动移民的多重身份从属于对女性高度不公的复杂结构。在父权体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社会层级的影响下，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机制往往对处于社会边缘女性不利。妇女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按性别、地理区域、教育水平和阶级来分层，她们在就业机会、技能培养、住房、土地和其它基本服务及资源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
- 国际上对女性劳动移民担任的不同角色均有公认标准：女性、劳动者和移民。最大的困难在于应对阶级和性别交集处的结构性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推动了亚洲劳动移民潮，决定了女性劳动移民的工作和角色（也即外籍妻子）。
- 移民身份、性别和工作不稳定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女性劳动移民处于弱势地位。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对此尚未做出充分响应，亟需进行更多地方和全国层面的干预。



1. 概述 .....	2
2. 对亚洲劳动移民进行交叉分析的好处 .....	2
3. 劳动移民在母国遭受的多重不平等待遇 .....	3
3.1 农村女性 .....	3
3.2 人口贩运和强迫移民 .....	4
3.3 家长制和移民 .....	5
4. 劳动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所遭受的歧视 .....	5
4.1 从事“女性”工作的女性劳动移民 .....	5
4.2 歧视 .....	6
4.3 站在目的地国家的交叉点上 .....	7
5. 从交叉视角看团结活动 .....	8
5.1 联合抵制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	8
5.2 联合抵制贫穷 .....	9
6. 政策维度 .....	9
7. 结论 .....	10
参考文献 .....	11

## 1. 概述

尽管“交叉性”这一概念在黑人女权主义的影响下诞生于美国，但它已经传遍全球，以至于有些学者称其为流行词 (McCall 2005)。美国的黑人女性被认为遭受种族、性别和阶级三大压迫。业内人士激烈讨论的话题包括：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该概念是否适用于其它类型的歧视；究竟要不要对女性遭受的所有歧视进行定义和分类。<sup>1</sup>

交叉性是一个分析框架。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遭受的压迫处于性别、阶级、族裔或种族、移民身份等不同形式的从属关系的交叉点上，因此有必要进行交叉分析。<sup>2</sup>交叉性意在考察不同维度歧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一概念已经得到包括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采纳。

在欧洲，对女性遭受的歧视类别进行情境化分析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欧洲女权主义者质疑种族分类法。她们建议采用其它方法来对歧视分类，如根据性别和宗教来分类。<sup>3</sup>年龄、残障、社会经济阶层、种族、族裔、宗教等因素均可形成独特的歧视结构。Lutz甚至列举了14种可导致歧视的差异性 (Lutz 2002, 13)。为此，交叉性学者呼吁，情境分析应当用来辨识社会分化、压迫和不平等，协助决策者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然而，已有文献很少述及美欧情境以外---如亚洲---的交叉性形式，抑或该概念可否用于对亚洲压迫现象的研究。因此，学术界人士和决策者应当致力于研究身份的多面性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更好地了解压迫、不平等和歧视结构在哪些

地方会形成交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目标是：解说亚洲劳动移民有哪些领域可从交叉性分析中获益，指出女性劳动移民在母国和目的国身份的复杂性。针对移民女性的歧视本来就很复杂，而从一种交叉性迁移至另一种交叉性使得情况更为错综复杂。本文将首先简单概述亚洲劳动移民的主要特点和交叉性分析的好处。接着，本文将讨论劳动移民在母国和目的地国遭受的多重不平等。然后，本文将从社会运动和政策视角来讨论交叉性。最后，本文将给出一个简短的结论。

## 2. 对亚洲劳动移民进行交叉分析的好处

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交叉性分析对援助工作和人权工作的价值 (Yuval-Davis 2006)，亚洲多个妇女团体也出于倡导女权的目的而采用了该概念。<sup>4</sup>交叉法有几个显著好处：首先，它同劳动移民的“亚洲模式”高度相关。Asis (2006)总结了亚洲劳动移民的下述主要特征 (i) 以暂时迁移为前提；(ii) 同一区域内发生大规模的流动（“区域内迁移”）；(iii) 以低技能/低工资人员的流动为主；(iv) 女性移民和未经许可的流动占据很大比例；(v) 招聘机构和中介（“移民行业”）的广泛参与。所有以上特征均同移民作为非公民的多重身份息息相关：女性、低收入、抵债劳动和无合法文件。

从量化角度来看，43%的亚洲劳动移民去了同一区域的其它国家；东亚国家吸纳了近650万移民，且该数字每年都在增长 (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0)。东亚吸纳的女性劳动移民居亚洲之首，占到了所有移民劳工的55%。香港是亚洲劳动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吸收了270万外劳（同上），其中90%从事家政工作 (Omelandiuk 2005)。在东南

1. 对于“交叉性”含义的讨论详情请参见Davis (2008), Anderson (2005), Lutz, Vivar and Supik (2011), McCall (2005), Knapp (2011), Yuval-Davis (2006)。

2. 交叉性方法的起源请参见 (2007), McDowell (2008), Nash (2008), Bond (2003)。

3. 交叉性分析是否适用于欧洲情境，请参见Lutz, Vivar and Supik (2011), Ferree (2011)

4. 例见APWLD (2011)。

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劳动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吸收了200万名外劳。2010年，新加坡人口中的40.7%是移民(IOM 2010)。据新加坡人力部统计，2010年底，持工作许可的外劳女家政工共计20.1万，相当于每五个家庭就有一名。

第二，交叉性分析认识到女性身份的复杂性(McCall 2005)，并能综合解释通常在哪些结构下，来自一些特定团体(例如：同族裔、同国籍或同宗教者形成少数群体)的女性被迫在有限的行业范围内才能找到工作。交叉性分析在此没有把单个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女儿，妻子或母亲)、阶级、性别/性征、国籍、族裔/种族、宗教、残疾、年龄、地理区域等作为女性身份的主要维度。在某些行业里，如家政业、(非正规)服务业、“娱乐”业和性工作，女性劳动移民的比重特别高。而无论从显性而言还是隐性而言，从事这些行业的女性劳动移民都属于有色人种、贫困阶层、某些宗教或种族。交叉法有助于对女性多重身份的认知。

交叉法的最后一个好处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身份间有哪些相互作用、相互聚集和相互关联的方式，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导致影响移民女性生活中的不平等、从属、非公正和歧视。这一方法帮助我们联点成线，分析女性劳动移民在母国和目的国的相对生活态势。理解女性身份在母国的形成过程与理解这一身份对女性劳动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处境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表明，家政外劳在目的地国家的处境并非塑造她们弱势地位的唯一因素；她们在母国时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权益，从而影响到她们对自己在目的地国的地位的看法。<sup>5</sup> 母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亚洲尤其重要，因为亚洲的劳动移民以临时性移民为主，多数最终返回母国。不过，移民经历也可能提高移民对自己权利的意识。如果打工所在地维护移民权利的活动频发，

并且在移民群体间传播，那么移民的权利意识就会大增(Piper 2010)。亚洲在此方面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这里，包括外劳家政维权行动在内的移民权利行动主义普遍存在。

### 3. 劳动移民在母国遭受的多重不平等待遇

移民女性的多重身份从属于一个对女性高度不公平的复杂全球结构。在父权体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层级社会的影响下，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机制往往对处于社会边缘女性不利。妇女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按性别、地理区域、教育水平和阶级来分层，她们在就业机会、技能培养、住房、土地和其它基本服务及资源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Piper 2008)。

#### 3.1 农村女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劳动移民是直接从农村地区招募来的。这就驳斥了以往的两阶段移民过程假设：也即，女性劳动者先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然后进行跨国迁移。农村女性近来吸引了国际组织的注意。例如，2011年，女性和性别平等机构间网络建立了农村女性机构间工作组。<sup>6</sup> “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等社会运动也开始关注贫困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包括农村妇女和移民。<sup>7</sup>

6. 该机构间工作组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IFAD)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负责协调，参与机构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ITC-ILO)、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SPFI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妇女署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7. “农民之路”是一个国际农民组织网络，积极参与了2012年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移民社会论坛。在论坛上，该网络代表发言说，“农民和移民其实是一体的。”(La Via Campesina 2012)。

5. 参见Mora and Piper (2011), Piper and Satterthwaite (2007)。



国际移民组织 (IOM) 于2012年发布农村女性和移民报告, 列举了追求移民的农村女性所面临的风险, 如享受不到基础设施和资源、被排斥在常规就业之外、无社会服务支持等。此外, 农村女性地处偏远, 无法查阅公共文件、享受公共交通、获取公众信息。尤其重要的是, 农村女性占全世界成年文盲的大多数 (IOM 2012)。在诸多因素影响下, 农村女性的移民体验同男性及城镇女性截然不同。农村女性和城镇女性所面临的动态也可能不尽相同。此外, 女性在家庭决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可能因为家庭性别分工而受到弱化 (Jolly and Reeves 2005)

处于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家庭急需脱贫, 而全球护理经济对女性护理工作者的需求较为旺盛, 于是贫困家庭决定先让女性成员移民。这一过程弱化了女性的自主决策力量 (Jolly and Reeves 2005; Ome-laniuk 2005; IOM 2012)。农村女性机构间工作组 (2012) 指出, “从每一项有数据支持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情况来看, 农村女性都远远落后于农村男性以及城镇女性和男性” (同上)。极端贫困、难以获得基础教育、缺乏性别平等、育儿和孕妇保健等问题共同构建了农村女性每日都必须应对的结构性制约。非法招募者和人口贩运者乘虚而入。

不过, 农村女性远非同质团体; 她们的经历因收入水平、社交家庭网络的可用性、地方和家庭性别动态的不同而不同。农村女性之间的差异不但体现在教育和收入水平上, 也体现在族裔、是否原住民、宗教和文化上。贫困阶层的数据往往缺失。例如, 世界银行(2006)报告称, 来自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的数据有限, 因为现有的调查并无捕捉移民信息的适当问题, 而且移民家庭在现有入户调查取样框架中所占比例严重不足。而现有样本之所以缺乏代表性, 是因为语言障碍、雇主/地主不愿让移民同外界交流、移民自身的恐惧、移民居住在偏远地区。数据不足也是学术和政策文献很少提及南南移民的一个原因 (Hujo and Piper

2007), 给女性研究及交叉分析增加了难度, 不过同时也更证实了此类研究的重要性。

### 3.2 人口贩运和强迫移民

因为造成不平等的结构错综复杂, 女性移民往往遭受相互交叉的几重维度的从属压迫, 所以很难区分她们究竟是劳动移民还是被贩卖、走私人口, 抑或是寻求避难者。有人认为, 冷战结束以来, 经济移民中的强迫迁移大幅增长, 成为南北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并且正在塑造着全球社会转型。人们也日益认识到, 强迫和自愿移民之间的区别含糊不清, 海外移民的动机及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胁迫因素也很难厘清。妇女的移民决策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除了导致城乡贫困、经济不平等和基础设施及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构外, 还有社会文化性别规范、两性关系和家庭内部的层级关系。家庭内部和社会上的两性关系可能影响到哪些家庭成员应当移民、在外居留多久、去哪一个国家等决策。例如, 菲律宾家庭倾向于让女儿移民, 因为他们认为女儿更可靠, 会汇款回家 (Jolly and Reeves 2005; Castles 2003)。

虽然性交易是许多遭受贩运的妇女所面临的悲惨命运, 但也有女性被卖给他人作为妻或做苦工, 尤其是担任制衣厂女工或家政工。国际劳工组织 (2002) 指出贩运儿童和童工之间存在关联, 贩运儿童是最恶劣的童工形式。例如, 越南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专有通道贩卖到河内或胡志明市等大城市, 或柬埔寨的妓院, 沦为性工作者。越南儿童还被人贩子从北越卖到中国, 与人为妻或充当廉价劳动力 (同上)。2005年的一项针对213名在华越南移民女性的调查表明, 她们中的30%被卖给中国人为妻, 很多人出于贫困才接受这样的安排 (91% 认为自家的收入不足以维生, 69%无业), 80%说这样做是为了给父母养老 (UNFPA 2006)。根据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 (2002), 每年遭受贩运的约15万南亚人口中, 有12000名儿



童。因此，人口贩运是极其恶劣的童工问题的延伸（同上）。贫困和家庭的无知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欺骗、债务奴役和经济不平等也驱使家庭将子女卖入性场所、制衣厂、街头行乞团伙、建筑工地、茶园、砖窑等。

此种复杂性衍生了何为人口贩运的辩论，对于是否所有移民性工作者均属于人口贩运范畴、如何量化人口贩运的辩论尤为激烈 (Jolly and Reeves 2005; Piper 2005)。人类贩运受害者、遭受偷运的人口、强迫移民和经济移民不能割裂开来分别研究。他们之间有诸多身份重叠，而他们在广义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也有颇多类似之处。

试以来自缅甸掸邦一个贫苦家庭的Noi的故事为例 (参见 Elaine Pearson 2000, 37-8)。在缅甸军政府统治下，人权被践踏。如果国民付不起钱，往往只能从事强制劳动。Noi家就是如此。Noi的朋友和其它青年妇女一样，常常沦为士兵性侵犯的对象。Noi决定离家挣钱，帮助父母脱离强制劳动，防止自己成为性侵对象。她打算去泰国当妓女，结果遇到了一个自称中介的人口贩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Noi清楚自己将成为妓女，但她并不十分了解未来的工作环境（休息日、工资、行动自由等），这一情形经常发生在那些“同意”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身上。尽管Noi的案例属于人口贩运，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它因素，因为Noi的多重身份都对她在泰国的遭遇有影响。她来自缅甸（军政府统治）的少数民族掸族，赤贫，又是女性。这些都导致了她和同类妇女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处于强奸、强制劳动、人口贩运和其它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阴影之下。

### 3.3 家长制和移民

有时候，孟加拉国、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政府当局出于“保护”妇女的原因，会禁止女性的流动。这些国家的官方数据显示，多数外出

移民为男性。例如，虽然孟加拉国是世界十大移民出口国之一，但在1991年到2003年间，该国对外移民中只有不到1%是女性。<sup>8</sup> 官方为女性自由流动权设置的障碍和限制增加了女性非法移民的可能性。亚洲开发银行声称，海湾国家和东南亚吸纳了巨量的无正式文件的孟加拉国女工。家长主义对家政工保护的态度往往将家政工人变成无力反抗的受害者。例如，从海湾国家返回的尼泊尔妇女抱怨说，尼泊尔社会看不起她们，而从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和西方国家返回的女同胞却受到社会的尊重。<sup>9</sup> 原因可能是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认知，即在海湾国家担任家政工作的尼泊尔女性常常沦为雇主施暴的对象，而在亚洲其它地方或西方工作的女性移民不会。

## 4. 劳动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所遭受的歧视

### 4.1 从事“女性”工作的女性劳动移民

在目的地国家，劳动移民往往在本地工人不愿就职的行业里填补缺口，从事所谓的3D工作（“肮脏”、“危险”和“高强度”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均为D）。许多女性劳动移民在传统上被认为“适合女性工作”的行业里工作，如家政和看护业、服务业、某些类型的制造业（如制衣行业）、酒店业、“娱乐业”和性行业 (Piper 2005; UNFPA 2006)。同这种性别化移民潮相对应的是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女性地位的提高，而正是这种提高导致了“传统”女性岗位无人问津，儿童、病人和老人护理工的缺口最大。

女性占世界家政工的绝大多数（83%），相当于全球女性劳动力总量的7.5%: 2006年，来自斯里兰卡的劳动移民中有52%为女性（相比一度达到的

8. 数据来自 UNFPA (2006) 和 IOM (2010)。

9. Omelaniuk (2005); UNFPA (2006); Timothy and Sasikumar (2012); Adhikari (2006)。



90%高点，这已经是一个重大回落），而这些女外劳中的大多数都从事家政业。据估计，89-90%的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劳动移民，无论是否持有合法文件，均为女性。根据菲律宾境外就业管理局的统计，在菲律宾，大多数移民家政工为女性（例如，2009年在该国雇佣的家政工中有97%为女性），而家政工也成为菲律宾外劳中的一个大规模群体（例如，2010年，家政工占到了菲律宾外劳陆地就业总数的36.1%）（Piper and Lee 2012）。

在越来越多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这些地方出现了推迟/规避结婚和/或生育的潮流。农村女性迁移到城市、性别比例失调（通常是偏好男婴的结果）等原因导致某些男性，尤其是农村男性，难以成婚：受过良好教育、有城镇生活经历的女性不再接受遵从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家庭结构的“传统”的为妻之道。全球化改善了通讯条件，提高了人口流动性。有的社会转而寄希望于来自较不富裕国家的女性以结婚为前提移民而来。例如，在过去，台湾和韩国人口的族裔组成极为单一，但如今，婚姻迁移司空见惯，部分原因是政府鼓励此类婚姻（Belanger, Lee and Wang 2010）。在台湾和韩国，婚姻移民暴增，21世纪头几年达到高峰。2003年，5万对台湾男子和外国女子成婚（上世纪90年代早期只有几千对）。同年，3万对韩国人和外国配偶成婚，占当年韩国结婚总数的10%（Belanger, Duong, et al. 2010）。在印度，村民们请中介从孟加

拉国或尼泊尔购买新娘，而这些新娘在移民成婚后往往因为自己的财力、族裔地位而受到歧视，甚至受到因为付钱给中介而视她们为财产的丈夫或姻亲的家暴（UNFPA 2006）。

2004年，日本向近65000名女性发放了娱乐签证（其中78%来自菲律宾）（Omelandiuk 2005）。在那里，娱乐业、酒店业和性工作之间的差别很是含糊。据报道，2004年，1000多名俄罗斯女性在韩国（该国视性工作违法）从事性工作，其中多数持娱乐或旅游签证入境（Lee 2004，被UNFPA 2006引用，26）。

#### 4.2 歧视

女性劳动移民在离开本国的多重从属结构后，往往发现自己身处目的地国家的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力市场（Piper 2008）。劳动法不保护某些以雇佣女性居多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如家政、娱乐和性行业。性工作在许多国家违法，移民性工作者很难在有需要时接触到当局或请求援助。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女性劳动移民只能依靠雇主提供合法地位、工资、信息和通讯、食物、住房和其它生存要素。限制劳动者自由选择雇主的政府政策和移民法律让她们对雇主的依赖更深一个层次，而且往往让她们无法更换工作场所。此种依赖造成了她们的弱势地位，使雇主更容易侵害她们的权益（UNFPA 2006）。

表1: 最低工资和家政工人(来源: ILO (Oelz 2011, p.3))

<b>受国家最低工资保护</b>
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法国、爱尔兰、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摩尔多瓦、荷兰、巴拉圭、葡萄牙、俄罗斯、罗马尼亚、西班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英国、美国*，委内瑞拉
<b>受行业/职业最低工资保护</b>
阿根廷、奥地利、巴巴多斯、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约旦、肯尼亚、马里、尼加拉瓜、尼日尔、菲律宾、塞舌尔、南非、瑞士、坦桑尼亚、乌拉圭、赞比亚、津巴布韦

\* 临时照顾幼儿者、临时陪护病人和老人者不受最低工资保护

家政工作很少受国家劳动标准或职业标准的保护。上表列出了在哪些国家家政工作受国家最低工资或行业/职业最低工资保护，目前没有任何亚洲国家上榜。此外，家政工作的价值计算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现有的生产和效益计算方法可能“低估”家政工作的价值。透过家政最低工资来评估劳动标准不一定准确，因为家政工人的工资往往按月计算，而非按小时计算，此外对工作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规定。如果不对工作时间做出具体规定，那么移民家政工往往被迫长时间工作。这也反映出，更广义的政治经济环境低估了女性在农业、自雇、家政、居家和护理工作这些不包括在产业分类框架中的领域里所从事的有薪/无薪工作的价值。更有甚者，家政工作的价值判断往往流于武断，抑或将家政工人物化，而不是根据家政工作者的技能和经验来判定。例如，在阿拉伯国家，菲佣被视为社会地位象征，所以她们的工资要比印尼或斯里兰卡家政工高。<sup>10</sup>

移民女性的失业率通常很高 (UNFPA 2006)。正因为失业率高，能从事的工作又局限于非正规部门、备受歧视，所以许多女性移民只好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的一份报告(2006)指出，这会导致东道国社会形成移民女性均为“不熟练”工人的认知，继而产生歧视、偏见、就业前景不乐观和贫困这一恶性循环。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在总结不同研究时发现(2006):“移民的健康不但受到性别、社会文化、种族背景、职业类型和法律地位的影响，还取决于他/她是否能实现收支相抵、能否享受服务、交通和健康保险”(p. 35)。跟就业挂钩的语言技能、工资和社会保险，以及融合进东道国社会的程度，也都是影响因素。健康问题还同女性移民在母国的生活水平有关。在她们的母国，医疗服务落后、卫生条件不佳、健康知识缺乏等情形往往存在。在适应新社会的过程中，移民女性的压力很大。她们还要应对潜在的身体/性侵害，艾滋

病暴露风险加剧。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移民女性的健康劣势。

#### 4.3 站在目的地国家的交叉点上

女性劳动移民在目的地国家还可能获得额外身份，从而加剧边缘化。她们可能因工伤而致残，在寻求医疗、金钱和社会救助时因自身地位而困难重重。如果她们没有合法文件，居住在偏远地区，而且/或者不熟悉当地语言和社会，那么她们寻求救助的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残疾还会影响她们的未来收入，她们可能沦为债奴，甚至不得不返回母国。交叉性分析必须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身份的不同维度因目的地的法律/政策、文化认知和其它社会状况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例如，如果目的地国家的法律禁止移民女性怀孕，那么在该国的怀孕女性劳动移民的身份就极其特殊。例如，新加坡会取消怀孕家政工人的工作许可，这就可能迫使该工人接受不安全的/违法的堕胎手术，损害生殖健康。此外，移民女性也无法享受正常家庭生活，因为她们的家人无法随行。

非法移民是劳动移民在目的地国家获得的另一个重要身份维度。没有与移民充分磋商就严格执法和实施限制性移民治理的国家往往存在黑市和非法实践 (Battistella and Asis 2011)。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曾指出，多数非法移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目的地国，此后的遭遇才让他们变成非法移民。<sup>11</sup>值得注意的是，决策不足导致移民陷入非法境地。为此，Castles et al. (2012) 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国家和市场需求之间出现矛盾: 国家执行阻止劳动移民的移民法，而市场力量创造对劳动移民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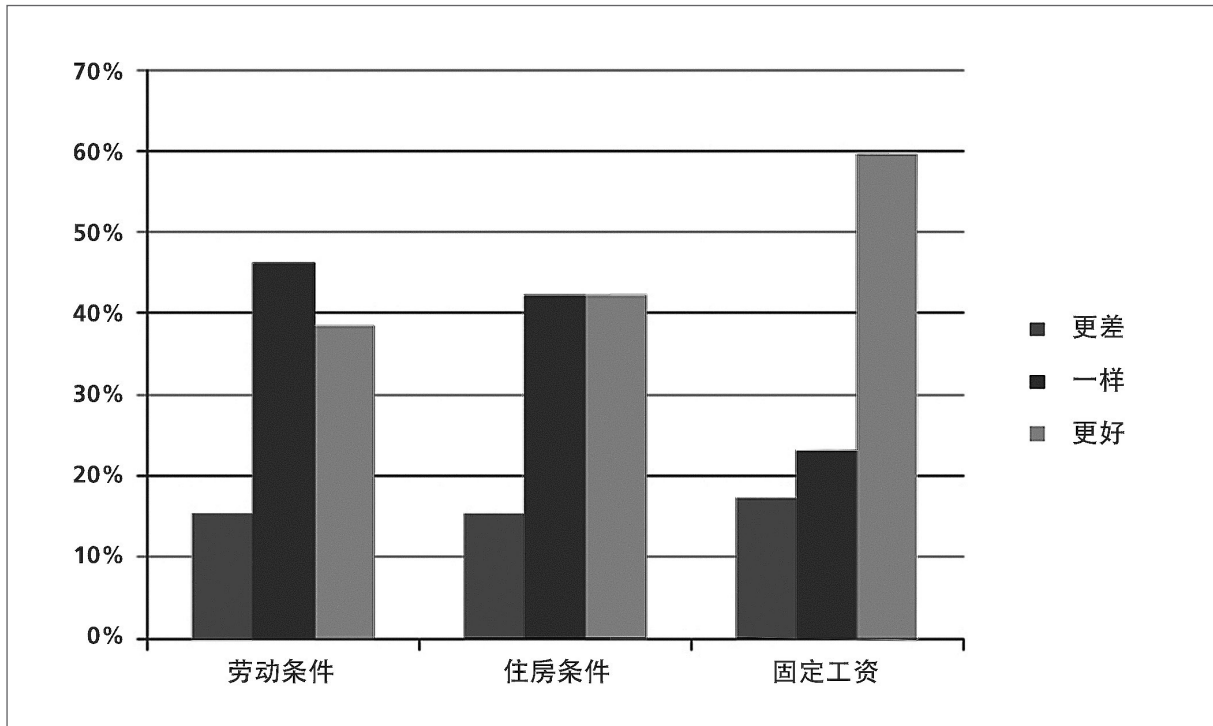
10. 更多信息请参见Budlender (2011a, 2011b), Piper and Lee (2012), Piper (2011), Thimothy and Sasikumar (2012)。

1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在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院的发言, 2011年12月14日, 2013年1月14日获取,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1723&LangID=E>。





图 1: 与合法工作相比较, 从工作条件、住房条件和固定工资三方面对非法工作的评价  
(来源: Belanger et al. 2010)



非法就业使劳动移民暴露在某些风险下, 但不要假定非法移民的权利一定会更少。例如, Belanger et al. (2010) 的调查显示, 从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日本返回越南的无合法文件移民中多数 (58%) 认为, 非法工作向他们提供了比之前合法工作更好的条件 (图1)。<sup>12</sup>

移民不合法身份和应有权利之间的含混关系说明, 我们必须考虑移民的多重身份和交叉性。例如, 看到上述 Belanger et al. (2010) 的研究结果之后, 我们就不能得出合法地位一定能改善工作和住房条件、一定能保证基本工资结论。我们要考虑劳动移民从事非法工作的具体情境, 要认识到非法性同一个由多重身份构成的复杂网络息息相关。移民目的地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往往限制劳动移民的自由, 而自由对后者的幸福安乐极为重

要。Battistella and Asis (2011) 对在新加坡的菲裔家政工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 菲裔家政工在新居留的时间越长, 工资、休息日等工作条件就越好。考虑到暂时居留 (循环移民模式) 和对担保人的依赖是亚洲迁移模式、尤其是外劳家政迁移模式的主要特点 (Asis 2006), 国家特权常常明确限制长期 (或永久) 居留或流动自由 (以及选择雇主的自由)。违背这一特权的劳动移民可能失去合法地位, 但长期居留和自由跳槽权可能使他们享受法律明确限制的一系列新的权利。也就是说, 失去正式文件支持后, 即便获得不了合法的永久居留权, 劳动者也可以成为“永久”居民, 从而享受同以前截然不同的权利和权益。所以, 在分析不合法地位和赋权之间关系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移民融入东道国社会的问题、他们在移民社区的社会参与度、对所在地基础设施和机制的了解、以及对在地社会风俗的熟悉程度等。

12. 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为女性。



## 5. 从交叉视角看团结活动

国际妇女运动已经认识到女性身份的交叉性，并且做出反应。全球层面对交叉性的讨论越来越多，针对身份不同维度（如性别和种族）如何相交、如何相互影响的讨论特别多。此外，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派专员发表报告，建议联合国条约机构（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联合国迁移工人委员会、联合国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为他们工作中均涉及的性别维度努力 (Ertürk 2009)。以下议题可促进更广泛的团结网络的形成。

### 5.1 联合抵制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派专员的一份报告建议说，“交叉法是 (...) 一个有用的概念范式，帮助我们一方面看到针对妇女暴力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看到女性体验的特殊性。同样，连续体法让我们看清不同情境（如和平和战争期间）下发生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 (Ertürk 2009: 49)。2011年，公民社会组织同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特派专员在马来西亚就交叉性和针对妇女的暴力进行了磋商。磋商活动吸引了来自亚太地区20多个国家的不同性别、文化、种族、原住民、宗教、残疾人、移民、难民、种姓和艾滋病患者团体的参与。他们共济一堂，讨论造成妇女从属地位、引发针对妇女暴力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压迫，重点放在宗教原教旨主义、国民经济军事化（战争和武装冲突）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上。此外，一些亚洲组织还参加了在德班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会上，与性别和种族主义相关的交叉性议题被列入议事日程。因为交叉法既认识到歧视的多重维度、性别和种族之间的联系，也揭示了它们对于针对妇女暴力的共同影响，所以种族歧视可以成为另一个团结作战的领域。

### 5.2 联合抵制贫困

女性联合组织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全球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平等的。家政工人、在家工作者、农村女性和她们所创办的国际网络特别关注性别问题和贫困问题的重合之处。有时，交叉法会受到指责，被指创造了太多的群体内身份，导致群体的分化、影响了群体团结。有一个公民社会组织的报告反驳了这一指控，继而声称交叉分析法帮助各团体看清了她们所受的压迫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分析压迫规律和相似性的有用工具 (APWLD 2011)。既然贫困（及发展）和移民之间存在关联，那么反贫困举措也是一个可以在交叉法指导下联合作战的领域。

## 6. 政策维度

国际迁移是一个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过程，受到政府政策、组织网络和个人网络的影响，内中动态跨越政治国境，也因此跨越民族国家管辖权。从这个意义来说，移民政策涉及多层次、多尺度的治理结构，参与的组织行为体数目众多，涵盖国际组织和地方政府。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迁移过程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弱势时扮演着中心角色。

全球来看也好，亚洲来看也好，各级政府尚未对移民女性因其移民身份、性别和不确定就业等因素交叉作用而形成的弱势地位做出充分的应对。地方和中央政府层面的干预不够充分，因为它们未能解决交叉性压迫。即使女性移民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决策者也主要从父权视角来看待她们，把她们看作个别男性施暴者的施暴对象，而不是有能力自主决策、在外国寻求就业以供养家庭的独立体。决策者更没有赋予女性劳动移民充分权利，特别是劳动权和经济权。各级治理机构倾向于忽视女性移民经常遭受的劳动剥削和虐待，在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方面也只做了最低可能的准备。

从原则上来说，移民女性受到非歧视和平等一般规范的保护。她们享受的实质性权利包括劳动权、不受债务奴役权等。她们享受的基于身份的权利包括妇女权利等(Piper and Satterthwaite 2007)。换句话说，移民女性可能担任的不同角色---女性、劳动者和移民---都有国际认可的标准。<sup>13</sup> 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应对处于阶级和性别交叉之处的结构性不平等，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无法应对移民的某些推动因素、也无法防止女性在移民后只能从事某些限定的工作、担当某些角色（也即外籍妻子）。因此，规范性主张必须有配套的公共政策落地。如果交叉法要在妇女身上真正产生作用，它必须在身份认知之外加入代表性和再分配议题 (Fraser 2005)。不过，在现实中，辨识女性移民身份的具体维度往往非常困难，因为这些身份维度不断随情境而改变。此外，决策者尚需谨慎，不能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给女性移民身份的多重维度带来更多压迫 (Yuval-Davis 2006)。他们应当观察社会运动、倾听底层心声，以便更好地洞察不同压迫维度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形成交叉性。

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法律和政策该如何适应交叉法揭示的多样性？在公共政策中考虑交叉性是否意味着给多元群体发言机会？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概念问题。

## 7. 结论

交叉法是一种方法，帮助我们梳理女性身份复杂性，全面理解和认识女性身份的多重维度及其相应的歧视、压迫和不平等。梳理完毕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政策分析中考虑交叉性状态。然而，交叉法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向决策者提供后者希望得到的“简单”结论。<sup>14</sup> 它激励学者和决策者审慎全面地考察移民女性所遭遇的不公正发生的情境，辨析不同情境下的具体情况。交叉法的研究成果该如何在公共政策和法律中体现及实

13. 适用的人权规范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国际公约》、《保护所有迁移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此外，国际劳工组织也有一系列同迁移工人有关的公约。

14. Yuval-Davis (2006)也指出了这一点。

## 参考文献

- Acker, Joan** (2006): »Inequality Regimes: Gender, Class, and Race in Organiz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 20:4, 441–464.
- Adhikari, Jagannath** (2006): »Poverty, Globalisation and Gendered Labour Migration in Nepal.« *In Poverty, Gender and Migration*, by Sadhna Arya and Anupama Roy (eds), 87–106.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Anderson, Margaret L.** (2005): »Thinking about Women: A Quarter Century's View.« *Gender and Society* 19:4, 437–455.
- APWLD** (2011): *Summary Report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sult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quality for Women«*. Kuala Lumpur: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APWLD) in Collaboration with Women's Aid Organisation (WAO).
- Asis, Maruja M. B.** (2006): *Gender Dimensions of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Report prepared for High-level panel on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York: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Fifth Session.
- Battistella, Graziano, and Maruja M. B. Asis** (2011): *Protecting Filipino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their Outcom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2011–12, Makati City: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 Belanger, Daniele, Hye-Kyung Lee, and Hong-Zen Wang** (2010): »Ethnic diversity and statistics in East Asia: »foreign brides« survey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 33(6), 2010: 1108–1130.
- Belanger, Daniele, Le Bach Duong, Tran Giang Linh, Khuat Thu Hong, Nguyen Thi Van Anh, and Belinda Hammoud** (2010):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from Vietnam to Asian countries: Process, experiences and impact.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Labour Migration from Vietnam to Asian Countries: Shar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NGO's experiences«*, Hanoi: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IDRC).
- Bond, Johanna E.** (2003): »International Intersectionality: A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Exploration of Wome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mory Law Journal*, 52, pp. 101–137.
- Budlender, Debbie** (2011a): *Meas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of domestic work*. Domestic Work Policy Brief 3, Geneva: ILO.
- Budlender, Debbie** (2011b): *Meas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of domestic work: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No. 30,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Castles, Stephen** (2003): »Towards a Sociology of Forced Migr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ology* V.37(1), 13–34.
- Castles, Stephen, Magdalena Arias Cubas, Chulhyo Kim, and Derya Ozkul** (2012): »Irregular Migration: Causes,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rena Omelaniuk (ed.), 117–152. Dordrecht, Heidelberg, New York, London: Springer.
- Collins, Patricia Hills** (1991):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renshaw, Kimberle** (2000):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expert meeting on the gender-related aspects of race discrimination*. Zagreb, Croatia: UN Expert Meeting, 21–24 November.
- Crenshaw, Kimberle**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V.43(6), 1991: 1241–1299.
- Crenshaw, Kimberle** (2003): »Traffic at the Crossroads: Multiple Oppressions.« *In Sisterhood Is Forever: The Women's Anthology for a New Millennium*, Robin Morgan (ed.), 43–57.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Dannecker, Petra** (2009): »Migrant Visions of Development: A Gendered Approach.«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5, 119–132.
- Davis, Kathy** (2008): »Intersectionality as buzzword: A sociolog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on what makes a feminist theory successful.« *Feminist Theory* 9, no. 67: 67–85.
- Dua, Enakshi** (2007): »Exploring Articulations of »Race« and Gender: Going Beyond Singular Categories,« in S. P. Hier and B. Singh Bolaria (eds.), *Race and Racism in 21st Century Canada: Continuity, Complexity, and Chang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 Ertürk, Yakin** (2009): *15 Yea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1994–2009): A Critical Review, A/HRC/11/6/Add.5*.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 Farree, Myra Marx** (2011): »The Discursive Politics of Feminist Intersectionality.« *In 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Debates on a Multi-Faceted Concept in Gender Studies*, by Helma Lutz et al. (eds), 55–65. E-book: Ashgate.
- Hujo, Katja, and Nicola Piper** (2007): »South-South Migration: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V.50(4), 19–25.
- Hull, Gloria T., Patricia Bell Scott, and Barbara Smith (eds)** (1993):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ILO** (2002): *Unbearable to the human heart: Child trafficking and action to eliminate it*.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ur (IPEC).
-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Rural Women** (2012): *Rural Women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Rural Women.
- IOM** (2009): *Gender and Labour Migration in Asia*.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2012): *Rural Women and Mig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IOM** (201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0*.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 IOM.
- (201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1*.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Jolly, Susie, and Hazel Reeves** (2005): *Gender and Migration: Overview Report*. Brighton, UK: BRIDG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Knapp, Gudrun-Axeli** (2011): »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 Inquiries into a Concept of Intersectionality Studies.« In *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Debates on a Multi-Faceted Concept in Gender Studies*, by Helma Lutz et al. (eds), 187–205. ebook: Ashgate.
- La Via Campesina** (2012): *Peasants and Migrants Are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Unity for the Full Rights of All Migrants*. 28 Nov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viacampesina.org/en/index.php/main-issues-mainmenu-27/migrations-and-rural-workers-mainmenu-41/1345-peasants-and-migrants-are-building-an-international-unity-for-the-full-rights-of-all-migrants> (accessed 11 January 2013).
- Lutz, Helma** (2002):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 way out of multiple dilemm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Brisbane.
- Lutz, Helma, Maria TH Vivar, and Linda Supik** (2011): »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debates on a multi-faceted concept in gender studies*, Helma Lutz, Maria TH Vivar and Linda Supik, 1–22. E-book: Ashgate.
- McCall, Leslie** (2005):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Signs* 30:3, 1771–1800.
- McDowell, Linda** (2008). »Thinking through Work: Complex Inequalities, Constructions of Difference and Transnational migrant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4), pp. 491–507.
- Mora, Claudia, and Nicola Piper** (2011): »Notions of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among Peruvian Female Workers in Chile.« *Diversities* V13(1), 5–18.
- Nash, Jennifer** (2008). »Re-thinking Intersectionality.« *Feminist Review*, 89, pp. 1–15.
- Omeliانىuk, Irena** (2005): *Gender, Poverty Reduction and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Pearson, Elaine** (2000): *Global Human Rights and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 Handbook*. Bangkok: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 In Women (GAATW).
- Peixoto, Joao** (2011): »How the global recession has impacted immigrant employment: the Portuguese case.« In *The Transatlantic Experience*, by M. Sumption and A. Terrazas (eds). Washingt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 Piper, Nicola** (2008):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Migration – Rights, Entitlements and Livelihoods*. London: Routledge.
- (2010):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 Temporary contract migration in Asia revisited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olicy and Society* V.90, 1–13.
- (2005): »Gender and Migration«,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olicy Analysis and Research Programme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CIM.
- (2011): »Toward a Gendered Political Economy of Migration.« In *Migra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icola Phillips, 61–82.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Piper, Nicola, and Margaret Satterthwaite** (2007): »Migrant Wome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Developing Paradigms and Key Challenges*, R. Cholewinski, R. Perruchoud and E. Macdonald (eds), 237–254.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 Piper, Nicola, and Sohoon Lee** (2012):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l Policy Paper Prepared for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Bangkok: UN Women.
- Siddiqui, Tasneem** (2008):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Asia*. UN/POP/EGM-MIG/2008/6,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 September 2008.
- Timothy, Rakkee, and S.K. Sasikumar** (2012): *Migration of Women Workers from South Asia to the Gulf*. New Delhi: UN Women.
- UNFPA** (2006):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A Passage to Hop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 UNRISD** (2005): *Gender Equality: Striving for Justice in an Unequal World*. Franc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 World Bank** (2006):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Mekong Sub-Region; A Synthesis Report*. Phase I, World Bank.
- Yuval-Davis, Nira** (2006):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13(3), 193–209.



## 作者介绍

**Sohoon Lee** 是悉尼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系博士生。她的研究方向是亚洲移民女性，重点是劳动和女性权利的关系、移民法和违法行为、社会运动和抵抗。

**Nicola Piper** 是悉尼大学人权副教授、德国弗赖堡大学Arnold Bergstraesser研究所副研究员。她的专长是亚洲劳动移民，重点是移民劳工权利、性别和移民治理。

## Imprint

Published by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Department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Hiroshimastr. 28 | 10785 Berlin | Germany

Responsible:  
Jürgen Stetten, Head, Dept.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Phone: ++49-30-26935-7451 | Fax: ++49-30-26935-9211  
<http://www.fes.de/asien>

To order publications:  
[Ulrike.Rebele@fes.de](mailto:Ulrike.Rebele@fes.d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7a Da An Plaza East Tower | 829 Yan An Zhong Road  
Shanghai 200040 | China  
[www.fes-china.org](http://www.fes-china.org)

Commercial use of all media published b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is not permitt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FES.

本文观点不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立场。